



夏传才 著

诗经研究史概要

增注本

清华大学出版社

诗经研究史概要(增注本)

夏传才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研究史概要(增注本)/夏传才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4
ISBN 978-7-302-14670-4

I. 诗… II. 夏… III. 诗经—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9724 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社总机:010-62770175

投稿咨询:010-62772015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编:100084

邮购热线:010-62786544

客户服务:010-62776969

印刷者:

装订者: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55×230 印张:19 插页:1 字数:265千字

版次:2007年4月第1版 印次: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定价: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诗经研究史概要》是二十五年前出版的旧作，1982年在中国大陆出版，1993年台湾出版繁体字竖排本，现（2007年）出版增注本。

大陆版本初版只印了4400册，早就脱销。正逢原出版单位中州书画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前身）改制，把纸型丢了，这书不赚钱，便没有再排印。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的繁体字本，至今一直在亚太地区 and 欧美发行；这些年，连大陆学人使用本书，也是从境外进口的。这显然很不正常。

按照本书初版时中国大陆出版学术著作的流程（接洽出版，了解作者身份，书稿三审通过，铅字排版和作者终校，再汇总各地新华书店上报的订数后开印），书稿要在一年多以前交到出版社，显然，本书的构思和草稿是在七十年代开始的。那时我正被流放在冰天雪地的内蒙古大草原监管，写作和搜集学术资料都极为艰难。1979年“平反”回大学工作，资料条件和写作条件改善了，但大地乍暖犹寒。所以这本书带着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明显地反映着那个时代学术思潮和文风的桎梏。

曾经有不少年轻朋友问我：你被监禁和流放二十三年，在那样的环境里，你为什么会研究《诗经》呢？我说，这问题很简单，因为没有别的事可做，我需要精神寄托，要找一块心灵驻足的天地。我在那个时候想：我这一生，就要与这茫茫无际大草原上的荒草一同腐朽了；我曾梦寐以求并为之歌唱的博爱、平等、自由，我曾经向往的名为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距离我的现实那么遥远。可是生命就这么结束，我实在心有不甘啊。“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唯一能做的事，只有为传承民族文化作一点贡献了。民族优秀文化是民族的命脉，尽管我们民族曾经承受许多苦难，而只要民族文化遗产不息，它就会产生凝聚力，我们的民族就必会复兴。事实上，我唯一能做的事，只有这一件。

那么,为什么单单选上《诗经》呢?这个问题也很简单。青年时代我是学诗的,我喜欢《诗经》,1941年、1951年都曾经试译过,多少有点基础。五十年代以后我不赞同当时大陆通行的诗风,想从中国歌诗的源头作探索,总结艺术经验。我的老友王亚平1982年赠我七律一首,书写成条幅,中间两联是:“文山诗海探索远,雪地风天行路难;不使才力付流水,独抱经骚苦钻研”,确是深知我心。

对自己写的文章,我从不“敝帚自珍”。任何学术研究,只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上个人的思考,进行归纳、演绎和推进,都只不过是人类认识长河中的一点一滴而已。这一唯物论认识论的规律,对任何人都不例外,何况我个人学问不大,我的认识更可能只是泡沫。这本书出版后的二十五年来,一直被一些高校用作研究生和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必读书,被大多数《诗经》著述列入参考文献或予以引用。一个普通作者写的书,能受到注意并起了点作用,当然是可以自慰的事,但同时又自知书的水平不高,而内心有所不安。

历年来已经有不少专题评论,从不同方面对本书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或商榷。

关于褒扬,我愧不敢当。人贵自知,拙著没那么大的成绩,之所以受到关注,只因为它是第一本讨论《诗经》学史的小书,对读者有个引领入门的作用,对同行有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此而已。

对本书的批评和指谬,可以推动学术进步,同时也增长我的学识,所以我是“闻过则喜”的;尤其是一批年轻的博士“青出于蓝”,我认为更是中华学术的福祉。二十多年中的一些批评和商榷,可以归纳于三个方面:一是有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问题;二是对胡适、鲁迅、郭沫若的《诗经》学评价问题;三是几处知识性错误的指谬。我在这里作如下的回答。

一、有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问题

我开始写这本书,就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勾勒两千年《诗经》研究发展的一个粗略的轮廓,评介其中主要的学派和名著,梳理历史上长期争讼的学案。其结果虽然做了一些,但做得远未达到理想。有些外国学者和港台同行评论说,他们为这本书“通篇笼罩着

马克思主义色彩而感到遗憾”；大陆也有学者认为书中“泛论”多，“过左”的词句“令人生厌”，还有的说“对马克思主义评价高了，今日大陆的学者也不同意”。对此，我回答说：“色彩”、“泛论”、“过左”时代通用的词句，在书中确实都有，但书中毕竟还有学术，我是带着桎梏跳舞的；即使如此，我还是提出一些超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而因此这本书差一点不能出版。

我经过二十三年的监禁和流放，最后仍然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外国朋友不能理解的。要说明这个问题，话要说得远一点。我在学生时代开始读《资本论》，那是白色恐怖年代，白天把书藏起来，夜间在菜油灯下偷着读。起初是欣赏那优美的文笔，读了以后又佩服作者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所作出的论证，书中的理论开始点燃了我思想的火花。但我又是一个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和“五四”新文化科学、民主思想洗礼的青年，这三种文化思想体系在我头脑中长期相撞击，而我又生性爱读书，爱思考，对三者不都全信，也不全不信，这就造成了五十年代以后我的命运和种种尴尬。我曾说过，“祸兮福所倚”，二十三年磨难给予我三大收获：一是锻炼了体质，二是磨练了意志，三是集中时间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我是天天必须读书的人，而那些年月允许我读的书只有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学而不思则罔”，通过读书，结合当时中国一切被颠倒了现实，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比较深一些的认识。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描述，都是非常精彩的，其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则是很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们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头脑里发明的，而是欧洲古典唯物论和古典辩证法的总结和创造性发展；我还认为，它的一些基本点，与中国古典哲学的许多优良成分也是相通的。只是中国古典哲学没有作出系统和完整地表述。因此，用学术的眼光来看，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在运用人类理论思维的科学成果。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对我们造成严重的伤害，便认为这个方法论全都不好，须知“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反马克思主义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在本书开篇就大段

引录马恩的论述,旨在说明必须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重视各个科学部门历代积累的材料及其相对独立的学术史,引录的目的就是在揭示那些掌握权力而横行无忌的教条主义者和庸俗社会学者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可惜的是我仍然未能完全冲出思想桎梏,书中有些引述和“泛论”,确实并不必要。这—是因为我毕竟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学风的影响,二是经过二十三年的折磨,确实“心存余悸”,如孔夫子所谓“暴虎冯河,智者不为”。说到底,还是我缺乏胆识。

现在,我们承认学术研究的多元化。承认我们不能只有一种方法论。当前,这首先关系到一个敏感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我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年来,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作治学的指导方法,获益匪浅。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揭示的是一般原理,即认识的共同规律,而各门学科又有其独立的发展道路,有其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资料、课题和具体规律。我们治学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所研究的学科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生搬硬套,就会产生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对《诗经》研究,只能用以分析诗经学的具体材料,解决具体问题。这样做,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永不会“过时”。

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十九世纪人类理论思维所达到的一个高度,一百多年来,人类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继续进步,较马克思时代都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也要丰富和发展,防止僵化。有关《诗经》来说,二十世纪西方相继兴起的历史语言考证、实证主义、比较文学研究、意象研究、原型研究、帕利—劳德理论、文化人类学研究等等新观念、新方法论相继传入中国,进入中国现代诗经学。排斥这些新方法论,抱残守阙,当然是错误的,也与多元化的格局不合;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只有这些新方法论才能发展现代诗经学,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不符合实际。古今中外每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论,都有其研究的层面和内容,对其研究的对象,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正确或接近正确的认识,一切有价值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无矛盾,其科学原理是相通的。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理论,借鉴各具体研究领域的方法论,有何不好?

二、对现代诗经学创始期几位大师的评价问题

评价当代有代表性的人物很难,同一个人物,中国和外国,海峡两岸,都出现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评价。虽说学术不等于政治,却常常与政治密切联系,尤其是现代有政治影响的人物。在今日,我们许多人都有个人的政治观点,不能不受政治的制约。对几位大师,现在我能够作出如下的表述。

对于胡适先生《诗经》学的贡献,虽然我在这本书中作了一定的肯定,但肯定得是不够的,而提出他在学术上的疏误和不足,又有过头的地方。对他在三十年代初倡导“整理国故”,我的评论还是因袭五六十年代“过左”的批判,是不公正的。我在2005年出版的《二十世纪诗经学》一书,重新作了评论。

鲁迅先生对现代《诗经》学的贡献,我认为应该载入诗经学史,并给予较高评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十年(1903—1908),鲁迅第一个用现代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批判儒家诗教以及解释某些《诗》句。他在“五四”时期的杂文,继续这种解释,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当然,鲁迅只是引用一些诗句,其解说或非原《诗》句的本义。这种“断章取义”的用法,自古有之。早自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孔子的说《诗》、孟子、荀子的“引《诗》明理”、汉代著作的“引《诗》为证”,一直到清代王夫之《诗广传》,龚自珍《五经始末大全》,都是借用《诗经》的诗句发挥社会政治杂感。这都属于“用《诗》”之列,也自来都在诗经学的研究范畴之内。鲁迅是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族危亡时代,以新思想来用《诗》的,又由于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影响,鲁迅用《诗》是不能不予以重视的。鲁迅没有《诗经》研究专著,他在大学讲课中也有若干属于他个人的论点,如“颂诗早已拍马”、并不全是温柔,“凄楚激愤之言时而有的”等等,在现代早已成为“名言”。不论现代学者是否同意,却不能不承认它们是广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可以深入讨论。至于我这本书中提出鲁迅“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诗经》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只是当时对鲁迅通行的评价称他是由革

命民主主义者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我袭用了这个说法。现代诗经学的奠基者不是一人,“五四”时代的几位大师都是,鲁迅是其中之一;至于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诗经》研究的奠基者之一”我也袭自成说,至于具体论证,说实话,我也说不清楚。可见写这本书时,“过左”学风的影响在我头脑中也还存在。

对郭沫若先生在现代诗经学发展中的贡献,我首先钦佩他的创新精神,他是《诗经》现代诗体今译的开创者,是《诗经》与现代历史科学紧密结合的开创者,并且在这方面建构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从历史分期问题、社会形态(奴隶制)和意识形态(天道观),到农事诗的解说和今译,在中国大陆引起两次学术争鸣。不论对他的观点同意与否,这个现代诗经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客观存在,而且具有世界影响。郭先生的学术研究又有疏失、主观等缺点,未脱诗人的气质。细心的读者会读出我的这些意见来。鉴于郭先生当时在政治上的地位和科学界的影响,而且这一部分文稿独立成篇,是交由《文学评论》发表的,当时也不能不如此委婉含蓄吧。

拙著《二十世纪诗经学》反映我近年对现代诗经学大师业绩的看法,可供参考。

三、关于批评家对书中疏误的指谬

人名和学者时代的讹错各一。陈大章是明末清初的学者,我写为明末。隋代学者刘焯,误植为刘炫。其他的“硬伤”可能还有,欢迎继续指谬。初版中有一句“三家诗是否都有序,很难说”,胡平生先生批评这话“没有道理”。这句话在1993年台湾版已经删去。也有人批评有些地方太简略;或某人某书未写,意见当然很好,这本书名为“概要”,又是论文按时代编辑,如果写《诗经史稿》,这些意见一定采纳。一本小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朋友如此众多的关注,在此一一致谢。

这些年,多次有出版机构约我撰写《诗经学史稿》。学术史研究是学术发展过程的分析 and 总结,目的是继往开来。上起先秦,下至二十世纪末,广涉文学、历史、语言、博物考古等各个学科,理清发展脉络,突出重点,总结经验,肯定成绩,探讨规律,明晰存在的问题,史论

结合,如再包括《诗经》在国外的传播和研究,必将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多卷本巨著,这已不是我这八十多岁的老朽所可能完成的了。因此,对约稿的盛情,我只有——辞谢。

也有几家出版机构要求我对这本书可作一定的修改和补充,出版修订本。鉴于当前的需要,的确是个好主意。但我思考再三,还是辞谢了。为什么呢?因为多年来,它为国内外大多《诗经》著作作用作参考文献,被许多专文评论,尤其是其中有批评和指谬,它之被注意的价值,也许就在于它是第一本《诗经》学史研究,带着那个时代烙印的试作吧。这本书实际上已不完全属于我个人,而进入了公共的学术文献库。我修改了再重新出版流通,是对公众、尤其是对批评者不负责任。大家引用了,或者批评了,又改过来重印,岂不易于误解引用的人错了或批评的人“无的放矢”?已经具有公共性流通的书,只能原样重印,同时接受批评意见,由本人说明其中的错误。

因此,本书重印,采取增注本形式,将可以采纳的批评者的意见,增加注释。原来的注释仍用①②③④圆形注码,新增的注释则用〔1〕〔2〕〔3〕〔4〕括号形注码。新增的注有两项作用:一是采纳批评者的指谬,指出错谬疏误;二是根据现在的学术进展,在几个地方略作说明。

另外,从历年的评论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九篇,用以反映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本书的主要意见,其中的有些批评意见是很好的,可补本书之不足。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重印此书,支持我完成这个增注本并写出这篇序。

夏传才

2007年1月 八十三岁

台湾版序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典籍，《诗经》学是古代中国的显学，现代世界汉学研究的热点。清理《诗经》学的发展过程，继往开来，加强海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是发展现代《诗经》学的必要条件。《诗经研究史概要》撰述的目的，是试图为《诗经》学史梳理出一个线索，勾勒出一个轮廓，初步评述主要的学派和名著，从而抛砖引玉，把这方面的研究推进一步。

本书原于一九八二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初版只印行四千四百册。据著者所知，日本的书店一次就购进五百册，再购时已销售一空了。十年来，大陆的许多书刊对这本书作了评介和推荐，各大学的研究生作为必读书。但是，大陆的图书发行陷进一个怪圈，学术著作的出版和重印都十分艰难，这本书一直未重印。听说海内外需要此书的学人竟辗转相托复印，使著者深感惶惑不安。

著者的惶惑是因为对本书并不满意，其理由有三：一是本书从收集资料、思考问题，到起草部分篇章，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那时著者的“本职”是种地或饲马，正像一位老友的赠诗：“不使才力付流水，独抱经骚苦钻研”，可是资料实难完备，内容难免有所空阙；海峡对岸和世界各国的新成果，更难以吸取；二是《诗经》学包括文学、语言学、史学、社会文化学、博物学等方面，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本书评述的内容远远不足；三是本书于八十年代初整理、充实和定稿时，著者虽已回大学执教，大陆尚未改革开放，执笔行文，不能不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著者一直认为本书应该写得比现在的成书要好一些，它并没有多大的成绩，其所以受到一点推许，只不过是这个课题本身具有重要价值罢了。

几十年来，台湾和世界各国都有《诗经》研究的新成果。台湾学者治《诗经》学史的论著，质与量都处于领先地位。可惜两岸长期隔阻，彼此很少交流。台北国文天地社决定重排《诗经研究史概要》，出

版台湾版本,在大陆以外地区发行,是推动学术交流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借这个机会,著者也得便将本书作了适当的修订。为此,谨表谢忱。

著者在《诗经语言艺术》台湾版序言中曾说:“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是炎黄子孙的共同任务,台湾与大陆更应该进行学术交流。”愿我们学术界同仁加强联系,增进友谊,经常往来,选择适当的项目开展文化合作,把我们共同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把现代《诗经》学提高到新水平。

夏传才

一九九三年三月

1982 年版序

《诗经》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作品，又是重要的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研究《诗经》，在我国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

一定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的集中反映；同时，“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84 页）。恩格斯指出：“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已的独立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501 页）经历了许多世代的《诗经》研究，也有自己的材料，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

任何科学研究，都必然继承前代的研究资料。《诗经》经过不同时代的人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经学家利用它发挥封建政治伦理思想，作为巩固封建制度的教科书。政治改革家通过它宣传社会改良主张，作为鼓吹政治改革的武器。文学家总结它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表现方法，推动文学的发展。史学家注重它的史料内容，用来考察古代社会生活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语言学家研究它的文字、音韵、训诂，写出一本又一本古代语言学著作。考古学家考证它的名物、典制，博物学家也没有忘记在这里留下痕迹的那些遥远年代的草木虫鱼，在各门科学史上应该占据的位置。两千多年积累下的丰富的研究资料，是我们的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

《诗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被推崇为经典，关于它的内容和关属的问题，各个时代各个学派的学者，都依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按照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因而过去的《诗经》研究，著述多至汗牛充栋，内容广至包罗万象，各家之说歧异纷杂，争论难决。面对这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初研读《诗经》的人，常感无从着手。

对《诗经》研究史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清理它的发展过程，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方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掌握发展的线索,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益的养料,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是建立当代新《诗经》学的必要条件。很遗憾,过去只有经学史中提供过一些零散的记载,近代胡朴安的《诗经学》就是初步综合这些材料的一本书,并没有超出经学的范围。五十年前蒋善国的《三百篇演论》,不论其观点和方法,还是资料的选择,距离当代我们的要求,相差都非常遥远。此外,还没有见到别的专著。建国以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诗经》,取得很大进步,但对《诗经》研究史的系统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

《诗经》是儒家的经典,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国家规定为政治伦理教科书,因此《诗经》研究以经学为主体。经学自然以宣扬儒家教义为基本内容,不能不严重地掩盖《诗经》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经学经过几次重大的变革,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潮有所变化。在各个学派的斗争中,新起的学派为了驳倒旧的学派,最初也以一定的求实精神,对《诗经》的某些方面,作出一些符合实际或接近实际的解释,积累了一些不无可取的训诂、考证等材料。经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和中国文化发展的阶段是密切联系的,所以我们也按照这条主线,把《诗经》研究史分为五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荀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唐初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应该注意的是:六朝文学创作繁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的文学理论著作,开始用文学的眼光来研究《诗经》,总结其创作经验,探讨其艺术表现方法。唐代自《毛诗正义》后,

汉学的训诂、篇义僵化,唐代诗人们则继续着六朝对《诗经》进行文学研究的传统。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论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

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封建社会解体,清古文学、清今文学、宋学的残余,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冲击下,一齐衰亡下去。清人的诗话,如《姜斋诗话》、《随园诗话》中对《诗经》艺术形式的分析,却有较久的生命力。

五、“五四”及以后的时期。早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五四”运动猛烈地扫荡封建文化,资产阶级在批判封建经学、恢复《诗经》本来面目的斗争中,起过战斗的作用。胡适是现代资产阶级《诗经》研究的开山人。古史辨派对揭示《诗经》的真相,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鲁迅、郭沫若都是马克思主义《诗经》研究的奠基人。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三

十和四十年代的闻一多，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开创了《诗经》新训诂学。

从以上简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二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佚等研究资料的研究。在这四个方面，过去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从孔夫子到闻一多，我们都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批判地继承，把《诗经》研究提到我们时代最新的水平。

在《诗经》研究史上，每个里程碑都是集几百年各派研究之大成，并且反映它们时代学术研究的新水平。朱熹的《诗集传》到现在，又是八百年了。这八百年中，《诗经》研究的上述四个方面，都有远远超过前人的进步。清代学者也有过集成性著作，那主要是限于一个学派的。“五四”至当代，《诗经》研究在各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当代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文艺学、文学史等研究领域，都有重大的科学成就，使我们能够在科学的基础上，综合所有的成就，集中人力，分工合作，完成一部新的集大成著作，建立我们时代的新的里程碑。

对《诗经》研究史的研究，是建立新《诗经》学的重要条件之一，当然也非一时一人之力所可完成。资产阶级学派曾经说，两千年的《诗经》研究是一本令人望而生畏的“烂账簿”，读者“如堕烟海”，越搞越糊涂。这个论点，至今在国内外还有影响。如前所述，我则认为线索分明，有规律可寻，尽管卷帙浩繁又歧义纷纭，而各个时代都有各家各派的代表著作，可以作出适当的评述。这本书是初步的尝试，希望能够对开始研究《诗经》的青年同志略有帮助，面对那一架架《诗经》研究资料不至于茫无头绪，从而节约一部分时间和精力。

关于这本书的成书，还需要作一点说明。

青年时代，我是写诗的，比较喜欢《国风》纯朴无华又真挚感人的抒情风格。我认为要学习借鉴它的表现手法，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练

习把它翻译为新诗,于是就开始试译。战争年代,炮火纷飞,试译就停止了。解放后教书,没开这门课,也只能在课余断断续续译一点。五十年代后期,我被下放到内蒙古草原,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在那与现实斗争隔离的日子里,我才能够集中精力学《诗》译《诗》。“祸兮福所倚”,这时我集中地系统地学习了马列、毛主席著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光辉,照亮了我生活和治学的道路,这也是我一生中研究《诗经》研究史的最难得的时间。伟大的导师使我明白: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批判地继承前代的资料,了解本学科的专门史,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不熟悉《诗经》研究史及其丰富的资料,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古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知识,没有对文字、训诂、名物的科学考证,凭臆断来译《诗经》,常常无异于画梦。所以,我开始学习古代史,研究《诗经》研究史,零零碎碎写出一些札记。这本书的前九篇文章,初稿都是在那个时期写的。党的三中全会使我获得新的解放,恢复工作以后,除了本职工作,我又先后开了《诗经研究》选修课和《古代文论》专题课,结合编印讲义,把过去的残篇充实整理成文,又补写了后面的五篇。其中几篇已分别在几个刊物发表,现在结集成书。

这本书名为“概要”,是说这十四篇文章按时代先后排列,可以看到发展的大概轮廓,评述了其中的主要著作和一些重要问题。因为最初是当一篇篇独立的文章写的,结集成书时,虽对几篇发表过的文章作了删补或改写,仍难免阙漏或略有重复之处。在《诗经》研究史上,有许多问题历代意见分歧,也有一些问题学术界尚未曾论述,限于个人水平,难免述评失当或引注失察,欢迎批评。

在京与王亚平重聚,读他的诗“二十二年归队来”,一片赤心向党,我深有同感。去年他书七律一首寄赠:

渭北初识正华年,新都近聚鬓霜添。^{〔1〕}

文山诗海探索远,雪地风天行路难。

〔1〕 1981年亚平写成条幅赠我,首联对句是“首都近聚额纹添”。后来,在《野草》诗刊发表并收入《两地书》出版,题《赠诗经专家夏传才》,这一句作了修改。今依作者自己的改正。